



加依尔山中的冰瀑

李显坤



后山,是克拉玛依人对加依尔山的习惯性称呼,这样的叫法,在别的地方也常见。这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山脉,位于城市以北,与塔城地区的托里县接壤。看着不起眼的山,但山脚一线海拔就已达500米,两地的法理界线就是海拔500米等高线。以等高线划界,这却是别的地方不多的见。

想起去年冬日一个暖阳天,闲暇得空,朋友约我进山看看。说是去看看,自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雪景之外,无非是碰运气或能看到鸭绿、盘羊、北山羊等。

过了38公里处的达尔布特河,行不多远的石山里,有一年与朋友在那里挖过野葱,我们便在附近停了车,步行走向那个山谷。踏在厚雪上的感觉,还别说,听着咔嚓咔嚓的脚步声,心生舒畅。

“进九”之后的山里,已是另外一番天地。皆白的山野空寂,微风贴着地皮在走,一片明黄的芨芨草随着公路,过往汽车时有时无的鸣笛声,使山谷愈发显得寂静。由此而获得的纯净感,足以慰藉人的心灵。

朋友说,不远处有瀑布。转过山脚,进入谷底,果然就看到了一道五六米高的瀑布,只是听不到一点儿水的喧哗声。

我们眼前的画面是静止的,冰瀑挂在石壁上,比未冻住前要宽出,也高出许多。

湛蓝的天空,映衬得冰瀑愈加雪白,阴影处泛着蓝光。在一片苍茫浑厚中,阳光在冰瀑上明晃晃跃动,这使得壮观成为唯一的形态。

我惊奇于这冰瀑,奔流的水,几下子就被寒冷干净利索地摀住了。惯性依然,纵然凝固了,却始终保持着流动的样子。由流动到静止,由无形到有形,再由柔软到坚硬,这是水在寒冷条件下的宿命。有无奈,却透着生机。

这一如曾国藩所言“未来不迎,当时不杂”,又似熊和猫的冬眠,在做着一种轻松的休息。

未完全凝固前,抑或凝固的过程中,水到了山崖边,就成了垂向地面的冰锥。水无常形,结果就是冰锥并不会完全一样。曾经的痕迹在于,因水量不同,历时不同,冰锥大小粗细也不同。多似一把把垂向地面的利剑,也有的像一道道飘逸在屋檐下的白练。

中间的水流最大,立得一柱擎天。我仔细观察,竟是中空的,完全冻住前,水流还从其间直流而下。

只看中间一段,由此向两边排开了一根根冰柱,虽粗细不同,却像毛竹林一般,晶莹剔透地一个挨着一个,层层叠叠遮蔽了整个崖壁。

因透明度极高,若专注地细观,可清晰地窥见其内部纹理。想起触感温润好的翡翠,是被称为冰种的,这道冰瀑就如冰种翡翠雕成的一座晶莹剔透的山子。越过冰瀑看远方,苍茫的山野也有了银亮的边缘。

这地粹是以一种静态蓄势待发力量,寒冷无非只是暂时凝固成了另一种“火焰”。

我折了一段冰柱在手,迎着阳光,便如儿时看着奇异梦幻的万花筒,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了。

冰瀑下是一面斜坡,昔日溅起的水花在这里定格,使冰层奇幻中透着雪白澄澈。瀑下原本的水面,已延展数倍,成了篮球场大的冰面,风的精灵在冰面上速滑。

冰面上有石头处都有隆起,有的形如莲花,有的状如卧羊。冰面顺着河道,一层一层由高向低漫去,错落有致,渐渐缩小,直至被雪覆盖如常。

冰瀑的形成本就是一场水与时间的博弈。一切都在悄然之间发生,冰瀑成形于最冷时节,又在春风初至时隐去。虽仅有短短数月,却凝聚了一冬的精华。

当然不会像冰层下的石山那样永恒,也不似自春至秋的河流那般欢快流动,却是一种短暂却极致的方式绽放了。有时候,一种令人珍惜的短暂,确能直抵人心,成为镌刻在记忆中的永恒。

当春天脚步忙乱地回归时,冰层会一件件褪去外衣。我曾经看到过的,高处的冰锥坠落下来,闪过一道光,随之发出响亮的玻璃般的破碎声。但在我耳中,这却是一种迎接老友新归的欢悦之声。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终结。

冰与水的转换,一如昼夜的交替,自然而然。水流以近乎无声的状态重新汇入河道,并在一路滋养着人畜草木,使生命在循环往复中顽强生长,无喜无悲。

彼时正值下午,离太阳落山只剩两三个小时,阳光以低角度斜照在冰瀑上,轻易便穿过了冰层,折射出七彩光晕。怀着极大的留恋,我在冰瀑前不停地变换位置、转换角度,眼前便呈现出一座天然的光之殿堂。光线在冰的表层欢快跳跃,透透光幕,我看到整个山谷都被染成梦幻般的色调了。

这一刻,寒冷的侵袭不再恼人,反而似一种温柔的包裹,让人不由自主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心灵的宁静。

朋友抬手作倾听状,自言自语听到了大自然在演奏着一曲舒缓的终章。

我也努力倾听,这乐章,似庆典,却没有些微喧嚣;有庄严,却并无渲染的刻意。终于,但见一层纯净的冰包裹了一座沉默的山,那山却在成长。

这足以让我心头震颤,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美,只需一场寒流,一次凝结,便给人的心灵带来永恒的触动。

朋友用手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他说冰瀑绝对是一道无与伦比的风光。我想,在那个冬日里,冰瀑如挚友触动了我的心灵,是得留个纪念。

折返一段距离了,心中仍有感念,回头遥望,那道冰瀑依然在斜阳下熠熠生辉。一切都在告诉我,所有的一切,原本就不是幻觉。

陈晔 摄

二丁目,皆是机缘

拙夫

3月18日,津门早春。于寻常奔波的日子里,这一天,因几个不期而遇的美好,格外值得动笔记录。

清晨六时许,我如常出门上班。推开楼门,小区院子道路上的地砖带着微凉凉意,才恍然察觉,昨夜已悄悄落过一场春雨。北方的早春总是很含蓄,雨落得轻,落得静,不扰人清梦,只悄悄润过街巷草木,为尚带寒意的清晨,添上一丝温柔的氣息。

晨风凛冽,气温仅有2摄氏度,比前日又低了几分。料峭春风虽不猛烈,却清劲入骨,拂在脸庞,清冷中带着春意。我拉紧外衣,快步走向公交车站,往日熟悉的候车人未见踪影,空旷的车站,只剩风声轻掠而过。不过片刻,一辆小车缓缓停在面前,车窗摇下,有人轻声唤我。定睛一看,是平日一同乘坐公交的旧识。

闲谈间得知,他前几日不慎崴伤了脚,不便于行走,这几日改自驾通勤。途经车站,见我在风中等候,便特意停下车捎我一程。一句简单的招呼,一次顺路的搭载,没有刻意,却在微凉的清晨,送来一份意外的暖意。

车行至复兴路立交桥,眼前的景象,让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话语。

东方的天际,横亘着一道壮阔无比的云带。自北向南绵延数里,白云、灰云、暗云层层堆叠,峰峦起伏,壁立如障,宛若一座悬浮于空中的苍茫大山。平原之上,竟现山岳之姿,这般奇绝云势,我与同行之人皆是平生初见。初春的天空本多清谈疏朗,忽而铺展出如此雄浑的景致,更觉得。我举起手机定格这一瞬,题“天堂天津”四字分享给友人,收到的回复皆是惊叹:海市蜃楼,人间仙境。

六点半,车平稳抵达单位。风依旧清爽,我没有径直进门,转而沿着海河缓步而行。岸边行人稀少,初春的海鸥或凌空展翅,或水面轻浮,为清冷河面添了几分灵动。忽然,水面传来几声清脆的声响,一尾鲤鱼跃出水面,翻腾转身,转瞬便沉入水中,不留一丝痕迹。在河畔行走经年,这般早春鱼跃的画面,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上午闲暇时,查阅方才所见的奇云,才知它学名锋面云,民间亦唤山脊云、云墙、阴阳天。前半夜春雨润透空气,后半夜冷空气吹来,冷暖气流相遇,便造就了这道界限分明、气势恢宏的云景。八点钟前,奇云便缓缓消散,融入天际,仿佛从未来过。

人生际遇,大抵如此。海鸥自往来,游鱼忽隐现,奇云倏忽聚散,人情淡淡相逢。倘若没有昨夜的春雨,没有友人意外崴脚,没有我如常候车、河畔漫步,那横空出世的云、跃水而出的鱼,便都与我擦肩而过。这一天,也终将淹没在无数平淡的日子里,无声,无痕。

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美好,从不在刻意追寻之中,而在不期而遇之间。云是机缘,鱼是机缘,人间一程温暖相逢,亦是机缘。

早春多偶然,人间多相惜。愿我们在奔波的日常里,仍愿抬头看天,低头观水,留心身边细微善意,收藏每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柔。愿四时安然,岁月清朗,所见皆温良,所行皆坦荡。

旧居院内的那株海棠,据说已有百年历史。在外面隔着院墙,能看到那株海棠枝干粗壮,花开得格外繁茂,粉白的花朵缀满枝头,仿佛在诉说着百年前的私语心事。

我专门了解了一些天津名人与海棠的旧事。清代津门查氏所建的水西庄以海棠闻名,主人查为仁曾记载“庭前海棠忽于十月间雪中盛开”,引得汪沅等文人争相赋诗,有女诗人写下雪中海棠的名篇,有说为《红楼梦》“冬月海棠”典故的源头。据说北洋总统徐世昌居津时,常常亲自督催园中的海棠,1931年海棠盛开时,曾邀请诸位兄弟小集赋诗,传为一时雅事。张伯驹自上世纪50年代起,每年必赴人民公园(人民公园原为李氏菜园)赏海棠,还写下《李氏园看海棠》,道尽海棠的柔美与灵动。在天津求学相恋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一生钟爱海棠,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复建西花厅时,特意遍植海棠,寄托思念。

清明时节,正是五大道海棠花节最热闹的时候,游

翻阅1941年4月24日《晋察冀日报》第4版“文化思想”副刊时,发现一篇《对自然科学的三认识》的杂谈,署名“孙力编”。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孙力编”是不是孙犁先生的笔名?该文是不是他的佚文?在孙犁的回忆文章以及相关研究著作中,“孙力编”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笔名。所以对这一笔名的归属,需要多方考证与审慎推断。

孙犁曾使用过“力编”的笔名,时间集中在1941年至1943年。1938年春他参加抗日工作,先是在冀中,后由于日寇扫荡,被组织介绍到冀西工作。1940年7月,他从晋察冀通讯社调到晋察冀边区文协,成为边区文协驻会六人之一,其间参与编辑了《晋察冀日报》副刊《晋察冀艺术》和《鼓》,文学期刊《山》和《晋察冀文艺》。1943年5月,文联机关解散,孙犁被安排到《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时间不长又被调到华北联大教育学院从事教学工作,直至1944年4月离开晋察冀去延安。这一阶段,孙犁发表文章除使用“孙犁”“犁”“林冬草”等笔名外,使用较多的笔名就是“力编”:1941年6月18日、1942年6月24日在《晋察冀日报》副刊《晋察冀艺术》上分别发表的《壮健性——纪念高尔基》和《(冀中一日)之后》;1942年12月23日《晋察冀日报》副刊《鼓》第三期上发表的《慷慨悲歌(札记)》;1942年出版的《晋察冀文艺》第5、第6合刊上共有孙犁三篇文章:《诗言志》和《战争与田园》均署名“犁”,大概觉得同一期杂志同一个作者有三篇文章有点突兀,《朗诵》就改用了“力编”的笔名;他还以“力编”的笔名,在《晋察冀日报》第1版刊登过两篇报道文联晋讯研究会活动情况和文联创办新杂志《山鼓》的消息,分别是1943年1月6日、1943年7月4日。如此看,这一阶段孙犁使用“力编”笔名发表的文章达六篇之多。孙犁的战友张学新在《孙犁笔名浅识》一文中对“力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曾自称自己的终生职业是

“孙力编”是谁?

张占杰



“编辑”。这本是一般作家不愿干的事情,他却认真负责,乐此不倦,全力以赴。大约发稿之后,心情舒畅,信手拈来,署了这个笔名。”所谓“力编”,即“犁编”的意思,完全契合他当时的身份。

《对自然科学的三认识》发表时间为1941年4月24日,当时孙犁正在边区文协当编辑,也参加《晋察冀日报》的活动。当时以《晋察冀日报》为中心的作者群(包括作家、文艺评论家、记者、诗人、编辑等)人员数量有限,大家虽属不同单位,分布在阜平方圆几十里群山掩映的村镇,但走动频繁,甚至朝夕相处,“反扫荡”期间有时会编在一组,集体转移打游击。这些人各有所长,一专多能,报刊版面需要时,他们会“跨界”写作,相互支援。诗人写诗,也写通讯、时评;记者写新闻,也兼写小说、科学小品、诗歌。《晋察冀日报》是边区党的机关报,因上述情况,文章作者无论使用原名还是笔名,很少出现重名现象。在当时相对狭窄的作者圈中,大家都知道“力编”是孙犁,“孙力编”很难不让人与“力编”及孙犁联系在一起。从时间上看,“孙力编”最早出现,以后的文章用的都是“力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孙力编”是“力编”的“前身”,后面的“力编”是“孙力编”的简化。

从文章性质来看,《对自然科学的三认识》属于思想杂谈,是《晋察冀日报·文化思想》的专栏文章。这一专栏是一个理论副刊,旬刊,由邓拓、顾宁编辑,创刊于1941年3月2日,1941年6月12日终刊,共出9期。其目的是“藉着它适当的提高与普及边区大众对文化的各部门的一般思想理论水平,同时藉着它以抗击与粉碎敌寇汉奸的卑劣无耻的思想进攻,藉着它以批判与克服一切对民族抗战有害的武断的顽固的落后与反科学的反动思想”。《对自然科学的三认识》谈的是自然科学知识在边区的普及问题,作者认为,“科学是不脱离民众的,不远离民众的,而准备为大众服务的,准备把一切科学的收获,交给民众的”。作者表示,“把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教授给人民,教授者应该了解到群众的丰富的创造能力,和他们的传统的工作经验。要认识出他们的天才,尊重他们的经验,改造他们的陈腐观念。同时自然科学的研究,应该以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指导”。作者将科学人格化,将科学家的工作上升到“政治”高度,摆脱了科学研究的“纯粹兴趣”的中性定位,这是当时边区对于科学及科学家的普遍表述。

研究一个思想者的历史贡献,需要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透过他对话语内容的选择,认识、理解作者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倾向。边区时代的孙犁,始终关注启蒙问题,但这种启蒙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主流意识形态推行的“普遍的启蒙”,主要是指文化启蒙,这也是孙犁日常倾注最大热情,每天都在做的工作;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启蒙”、“人”的觉醒,这是孙犁文学作品贯穿始终的思想脉络。《对自然科学的三认识》所谈属于“普遍的启蒙”,在日后所编报刊中,孙犁持续渗透了这一思想,以1946年至1947年编的《平原杂志》表现得最为明显。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科学、卫生、教育类栏目,以此实现他关于科学普及的想法。《农业指导》栏目,结合农村生产情况,提供一些有效的科学种田方法,如《施肥》(第一期)、《怎样研究农业生产技术》(第二期)、《今年小麦黄疽的惊人损失与今后预防的办法》(第四期)。《卫生》栏目,针对农村群众落后的生活习惯,力图通过现代科学知识传播,有效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刊登了《谈水》(第一期)的科普小品,孙犁还以“土豹”的笔名配合文章写了科普诗《咏水》。《小科学(新发明)》栏目,介绍新的发明,如《新式自行车》和《珠算乘除定位器》(第一期)等。孙犁注重从群众的日常生活经历入手,普及科学观念,使群众相信科学,养成讲科学的习惯。这些具体的工作,切实地实践着《对自然科学的三认识》中提出的工作设想。我们将《对自然科学的三认识》看作孙犁的佚文,这也是一个佐证。

在很多读者印象中,孙犁是作家,多发表小说、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但事实上,在边区时期,孙犁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编辑工作,在各类报刊上,不断有时评发表。这篇文章既是思想杂谈,也可以看作一篇时评。从1941年至1950年,收在《孙犁文集》中的有9篇,之前我们还发现了3篇时评佚文,即《今年新年》《今年新年,怎样闹玩意》《论继承》,加上这一篇,孙犁这类佚文就有4篇了。

客络绎不绝。文艺演出的歌声,市集上的吆喝声,与花瓣飘落的轻响交织,充满烟火气息。我顺着街道慢慢走,看路边的艺人演奏乐器,旋律伴着花香飘向远方,看非遗摊位的师傅现场展示手艺,满是老津门的传承与匠心。五大道的春天,既有自然的灵秀,又有人文温度,历史与春光交融在一起。

路边的文创小摊上,手工制作的海棠花戒指吸引了不少游客。戒指的造型很简单,上面缀着小花,看着软萌可爱,只要几元钱一枚,很受年轻人的欢迎。这小小的戒指,既是逛五大道赏海棠的小纪念,也是这里春天独有的小信物。买一枚戴在手指上,便把五大道的春日浪漫随身带着了。

走在五大道,花海里到处是年轻女穿校服的身影。大理道随处可见拍照打卡的人。有的站在海棠树下,笑容清甜。有的两人并肩而立,对着镜头比出俏皮的手势。有的举着手机自拍,小心翼翼定格与海棠的同期瞬间。更多的是让同伴帮忙拍,自己或倚靠在老洋房外墙,或徜徉在落满花瓣的步道上,把海棠花作为充满诗意的背景。美丽的身影与花海相映,成为春天里最鲜活的风采。



津派文化的文学表达(二)

近代天津戏曲的在地化转译

郑莉

近代天津,帆樯林立,舳舻千里。作为南北漕运的咽喉枢纽,天津因漕运而兴,因通商而盛。五方杂处、华洋共居,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品格:既有水陆码头的粗犷豪爽,也有商业都市的精明务实,更因租界的存在而浸染了西方的现代气息。这种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态,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一方丰沃的土壤。天津的戏曲由粗犷而鲜活,世俗而热烈,充满码头特有的生命力和江湖智慧。外来艺术在进入天津的那一刻,就与这里的欣赏趣味、市场机制、媒体生态、社会心理发生着互动。它的在地化转译,不是简单的移植或被动的地方化,而是一场根植于天津历史、社会及文化语境中的主动、双向的调适与再造。

天津戏曲的在地化转译,呈现出内外两个维度:外部表现为戏曲演出空间的现代化转型。传统的露天野台或简陋茶园被规模更大、设施更完善、管理更规范的新式戏院取代。剧场内部空间布局的变化呼应了市民阶层的分化与不同的消费需求。镜框式舞台为复杂的灯光、布景等的革新提供了物理空间,推动戏曲从听的艺术向听与看并重的综合艺术转化。演出中心区从租界外向租界内的迁移,则反映了城市经济中心的变迁、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和市民分层化消费的开始,为戏曲的多层次发展提供了空间基础。演出场所结构与功能的演变,标志着天津戏曲演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内部则集中于剧本内容的改编与舞台实践的全面革新。为迎合天津观众的审美,各剧种纷纷改造传统剧目或新编时装戏。题材上侧重市民化与生活化,出现了如《杨三姐告状》等聚焦百姓生活、情节曲折、情感质朴的作品,以及奎德社取材时事、关注现实的时装新戏。叙事上则追求更强的戏剧冲突和更紧凑的叙事节奏,甚至吸收小说、电影情节以制造悬念;声腔上,何达子、元元红等河北梆子艺人,以天津语音改造山陕音韵,并吸收京剧演唱技巧,创立了音韵更醇厚、行腔更婉转、更具亲和力的梆子新腔。小香水、金刚钻等女演员在保持梆子高亢激越特征的基础上,注入女性特有的柔美与细腻,形成了卫派梆子刚柔并济、激越中蕴含深情的艺术风格;作为戏曲码头,天津舞台名角云集,激烈的竞争促使演员必须拿出绝活才能立足,形成了注重舞台效果、追求火爆场面、强调表演技巧的风格。以黄月山、李吉瑞为代表的武生演员,兼采南北之长,开创了开打火爆激烈、表演惊险刺激的津派武戏。评剧借鉴河北梆子和京剧的板式声腔、艺人表演和表演技法,对唱腔念白、伴奏乐器、身段步法等进行规范化改造,李金顺、刘翠霞等女伶群体的崛起,打破男旦格局,形成了评剧细腻、真切、多元的表演风格。

与此同时,报刊、商业和观众三者合力,成为戏曲在地化转译的重要推手。

当时主流报刊多辟有专门的戏曲栏目,通过刊登演出广告、剧评、演员访谈等,建构新的审美标准与舆论导向。“捧角”与“倒角”的相关评论,直接影响演员的市场价值和观众的审美趣味。专业的剧评提升了市民的整体欣赏水平。同时,观众的反馈也会见诸报端,对戏班形成舆论压力,加速市场的优胜劣汰。

商业资本是影响和改造天津戏曲生态的直接力量。戏园经营者为追逐利润,积极引进演员聘用制、剧目轮换制等现代管理制度,提升戏曲演出的市场化程度。“角儿”成了市场竞争的核心,在提升演员价值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竞争。

观众作为消费者,是决定戏曲在地化转译成败的最终裁决者。天津观众的审美标准强调感官的冲击和审美的愉悦:唱腔要好听,身段要好看,情节要过瘾。不同层次的观众审美取向又截然不同:精英阶层看重艺术的规范、传承;中产阶层支持艺术创新,看重演出的性价比;广大底层市民则偏爱“炸窝”的武戏。商业化的消费逻辑,将观众的选择权放大,而观众的挑剔又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倒逼机制,迫使演员不断精进、持续创新。“北京学戏、天津唱红”,成为衡量一个演员艺术水平和市场号召力的重要标杆。



沽上丛话